

“竞争社会”中的“齿轮人”： 马克思机器技术批判的历史隐喻

代砚春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从马克思技术批判的视角来看，机器大工业生产建立了客观化的生产塑形和技术构序模式。“齿轮”不仅表现为机器技术体系具象化的功能性部件，还表征现代人在资本主义“竞争社会”中物性生存的历史性定在，即“齿轮人”在资本逻辑的“自由”驱动中展开在世竞争。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机制使“齿轮人”生成了三种面相：一是将“齿轮人”抛入随时被现代生产所舍弃的恐惧中，使其变成“经济上有用而政治上无害”的柔顺个体。二是用资本自由的幽灵性在场掩盖人的自由的空场，使“齿轮人”围绕资本制造的虚假自由空转。三是用现代性的“金钱—自由”幻象将“齿轮人”困在一种悖论式的“有意识的—无意识状态”中，使得竞争者“齿轮人”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在消解“齿轮人”存在样态的方案中，“冷却说”拒绝技术演化，“加速说”赞同资本化的技术加速，二者都不能克服资本主义的“技术范式”。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技术应用的实践范本，它在制度保障的前提下追求技术发展和成果共享，从而演示了消解“齿轮人”生存、驯服资本的具体可能性，将现代化运动引向共产主义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关键词：自由竞争；“齿轮人”；资本权力；技术批判；中国式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25)03-0015-11

我们常常听到人们说“赶时间”“时间不够”“没有时间”，并用“内卷”“精神内耗”等消极概念去描述自身的部分现代感受。这些体验真实地切中了当下的一种时代状况，即人们想在时间加速的生存态势中通过付出时间的量来交换生命的质性内容，但结果总是得不偿失。实际上，我们知道，时间并没有真正加速，被压缩的是人们的生活内容，而生命竞争的基本结构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就得到了揭示。对此，李嘉图有两个基本观点：其一，现实的经济世界是一个稀缺性的世界，人们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来应付需要以及欲望的增长。其二，现实的经济世界生成了一种全面事物化和客观化的生产关系，人们必须在这种客观抽象的基础上观察社会的动态构序。历史唯物主义继承了这种探析社会发展的客体向度。马克思将其描述为“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1](36-37)}。恩格斯同样认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会归结为竞争”^{[2](72)}。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马克思所描述的资产阶级社会理解为是一个现代“竞争社会”。它在“自由竞争”原则的支配下将一切都推入一种敌对状态，在资本逻辑的座架中修改了人们现实的生存样态，主体自由的丧失以及全面异化几乎成为竞争社会中人们的宿命。

收稿日期：2024-09-08；修回日期：2024-12-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批判研究”(20CKS008)

作者简介：代砚春，男，河北保定人，哲学博士，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联系邮箱：csudyc2023@163.com

一、机器大工业时代“齿轮人”的物性生存

马克思在分析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架构时，从工艺学的视角客观地描述了机器大工业时代的生产塑形和技术构序模式，认为其最为显著的变化有两方面：一是从“物体系”的显性外观来看，劳动资料的变化从工场手工业的工具进化为发达的机器体系，“或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器体系”^{[3](88)}。二是从生产关系的隐性调整来说，手工业时期的主体性劳动技艺让位给机器系统的客观运行机制。可以说，这种客观的工艺生产的进化修改了社会历史的基本图景。具体来讲，“工场手工业劳动活动中曾经出现的劳动者直接的协作与工业生产中劳动分工条件下出现的结合关系场境，在机器化大生产过程中彻底成为与工人无关的物性机械装置的内部机制”^[4]。换言之，这种现代生产中的隐秘场境的转换将劳动者整合进了机械装置中，劳动者共在协作的社会空间被机器系统的工厂物性空间所代替。换言之，相对于以往的社会样态，现代“竞争社会”呈现出不同的面相，即机械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认为自动的机器体系是机器的最后形态，它将劳动生产过程变成了一种自动的具有幽灵般特性的生产机制。机械系统作为科技对象化的客观合目的工序否定了工人体力劳动的主体性在场，将之变成了机器内部的物相化局部分子。或者更直接地说，工人变成了客观自为的机器的零部件。当然，马克思清醒地看到，机器体系对劳动分工与协作的吞噬以及将人“物化”的机制并不是自主发生的，它是以资本的主体设计为前提的，或是说，问题在于机器体系的资本主义应用。由此，这种“物化”的发生就从一种生产机制扩展成为社会机制。基于此，马克思断言，资本家的动机“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表现为个人的狂热的事情，在资本家那里却表现为社会机制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制的一个主动轮罢了”^{[5](683)}。尽管马克思并没有从对立的角度将工人命名为“从动轮”，但是机器“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自己的灵魂”^{[3](91)}。同样，工人也随之通过这种力学规律被理解为是社会机制的“从动轮”。显然，在机器化大生产中，客观自为的社会机制将作为“主动轮”的资本家与作为“从动轮”的工人都转换为“齿轮人”，进而整合到一架庞大的资本机器中。“齿轮人”由此成为与马克思所谓的“竞争社会”相匹配的历史隐喻的主体，而“竞争社会”的机械形态也随之呈现为“齿轮化”的时代性的具象面孔。

在马克思描述的“齿轮社会”中，“齿轮人”以及作为装置的机器体系是其基本具象。批判工艺学告诉我们，机器大工业的核心机制是用机器来生产机器，机器本身是其基础的生产资料。只有这样，现代生产才不再是一种主体性的劳作，而是一种客观合目的性的机器运作。这是一种从“人脑的器官”到“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的变化。按照加速主义者的判断，现代社会的竞争首先表现为“竞速”，它是一个由“技术的加速、社会变化的加速和生活节奏的加速”^{[6](86)}所组成的加速循环模式，而技术的加速则是社会“竞速”最基本的维度。从经验的层面说，马克思描述的“加速故事”仅仅是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工具协作到大工业时期的机器生产，而今天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速度越来越快，影响也越来越深远。纵观技术的“加速史”，我们完全可以说，“技术的以及尤其是科技的加速发挥着社会变化的强有力发条的作用”^{[6](183)}。可以说，技术加速不仅是整个社会加速循环的逻辑起点，还从一种单纯的工具性手段畸变为一种社会目的，从而契合了资本主义生产机制中的“价值增殖精神”，进而塑造了“技术决定论”与“技术胜利论”两大资本主义信条。

问题在于，“机器成了资本的形式，成了资本驾驭劳动的权力，成了资本镇压劳动追求独立的一切要求的手段……所有这些机器，都是为了镇压罢工而发明的”^[7]。这就是说，一方面，机器体系作

为技术加速的具体代表被置入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对抗结构中，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转化为“铁人”与工人的对抗。这造成的后果是“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8]。于是，机器大工业时代的技术景观就随之拥有了两副面孔，一副是资产阶级将技术加速、技术进步等同于资本主义，一副是阶级对抗演变成了反对机器进步的斗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马克思让我们看到，技术的加速、机器体系在生产中的快速上位正是作为“主动轮”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主力”牵引整个资产阶级社会机制的客观运作的结果。

但是，让资本家意想不到的是，马克思的“齿轮人”不仅仅是一种技术加速视角或是说生产力进步视角下的功能性设定，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它是一种存在论判断。也就是说，不管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统统作为机器的“齿轮”而存在，这是一种基于泰罗制的现代管理体制下的生存状态。在机器大生产的机制下，作为“一般智力”对象化产物的机器体系因其“自动性”而拥有了独立性和自主性，它最能体现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追求的“合理性”：主体的因素必须被“石化”为客观的要素从而具备可计算性和可操作性。这样，机器就成为资本主义的最佳代言人，作为一种“物体系”，它本来是一种受造物，现在它反而拥有了“意识”，要求“合理机械化的和可计算性的原则必须遍及生活的全部表现形式”^[9]。工人现在是机器体系的看管者和照料者，甚至是生产过程唯一客观化的主体出错者，即“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肢体”^{[3](90)}。同时，这种“有意识的肢体”将进一步退化为“无意识的肢体”。原因在于，机械生产不仅将工人变成了孤立的原子，用力学规律来中介工人们直接的有机联系，而且还将这种合理的机械化注入工人的灵魂里，使工人的心灵和观念都遵循机器生产的量化和标准化。人格作为人之为人的保留之地也被机器所侵扰，这预示着工人作为“无意识的机器肢体”的形成。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容易理解与资本主义的机器体系直接打交道的工人的“齿轮化”，毕竟我们能够在机器工厂中直接观察到工人那种被抽去灵魂的单调的、重复的、无意识的物性生产，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并不直接出现在机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家的“齿轮化”呢？

其一，资本家虽然不在生产之中，但是也绝不在生产之外。这就是说，虽然资本家并不从事直接的机器生产，但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它在现代工厂中化作一双“权力之眼”，“监督工人有规则地并以应有的强度工作”^{[5](359)}。资本对劳动力的指挥权和控制权最初体现在资本家在交换市场上购买了工人劳动力的时间，然后以合同的方式宣称它占有后者(占有这个劳动力商品的全部)，即后者成为它的私有财产。由此，资本家在生产未开始之前就已经获得了对工人的支配权，使得劳动从属于资本。在具体的机器体系的生产中，资本家又发挥着管理者和调节者的作用，它时刻都在谨慎协调着机器本身的客观工序与工人这一“智能器官”之间的关系，担心机器生产的正常程序因劳动者这一不可控因素而被打乱。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于机器体系中是“在场”的，它是机器的占有者，同时又是机器的部件之一。即便是在当代的资本主义企业进行了股份制转型，发生了经营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也并不意味着资本家就脱离了机器技术体系的生产。从本质上来说，只要资本家关心着、追求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即便是其身体在生产中“缺场”，也不能真正地置身事外。生产的在场是“主动轮”内在的生命意识和活动的精神准则。

其二，资本家的基本信条和生存观念便是“我生产故我在”。虽然相对于劳动力商品而言，资本家的存在方式不是被迫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但是，资本家需要不断重复获取剩余价值与扩大再生产的机械循环才能维护自身的身份和地位。经济上的竞争使得资本家也必须作为“齿轮人”不断地进行资本积累。而在这种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崩溃都能瓦解资本家的“资本人格化”的形象。为此，资本家不惜一切代价地保持机器运动的惯性和加速，并同时制造出消费的加速，以顺利完成资

本的代谢。在这个意义上，甚至资本家私人的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5](683-684)}。这就是“竞争社会”中资本家作为“齿轮人”的“痛并快乐着”的生存样态。资本家钟爱机器，因为它们是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为此，资本家必须也像“齿轮”相互咬合般，上紧资本欲望的发条，疯狂运动起来。

其三，从资本逻辑的座架来说，作为“主动轮”的资本家与作为“从动轮”的劳动者，除了是资本主义社会两大对立的阶级之外，二者在“齿轮社会”中拥有同样的宿命。他们都像机器齿轮的运转那样，是客观的和自动的，一旦开启便无法停歇。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休止追求、对资本积累的无限制扩大与工人工作日的无限延长、劳动强度的不断增大之间形成了一种“坏的循环”。当然，在这个过程中，看上去被砸坏的是“工人”群体，但实际上资产阶级同样被砸坏，只不过这种破坏隐藏在社会机制的深处。在资本逻辑宰制下，特别是在机器技术加速的现代化催逼下，生产最大化的渴望被置入“主动轮”的集体无意识中。“主动轮”听命和服务于资本逻辑的无声强制和进步胁迫，根本没有反抗的权利。人们能够从机器体系“齿轮”的相互咬噬和飞速运转中观察到一种资本赋予“主动轮”的“积极性”和“肯定性”，即“主动轮”最大限度地释放生命的潜能，时刻都在寻求更多更大的现代财富。这是“齿轮化”现代生产的第一原则。机器体系的运转，“齿轮”般的生存状况，宰制了资本家的未来，直到私有制被彻底破坏。

二、“竞争社会”中“齿轮人”自由竞争的三种面相

在机器大工业时代，马克思真正走进了资本主义工厂中，他看到了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5](438)}。那么，什么是马克思所说的机械怪物的“魔力”呢？从它的躯体方面来说，不管是从构造的繁简程度还是从动力来源的角度来说，机器体系都是手工业工具所不能比拟的。它表征着生产工艺的客观化要求与生产方式的客观趋势。并且，正是与“一般智力”的融合，它才能从庞大的躯体中释放变革社会图景的魔力。也就是说，它一方面将“齿轮人”作为一种基本的物性设定，修改了人们的生存样态，使之成为一种“常人”并为“共处同在本身为平均状态而操劳”^[10]；另一方面，它又重新结成了人们之间的“齿轮般”运转的物性社会关系，让人们在技术世界构筑的“一个非个人的‘物的’必要性与‘物的依赖性’的领域”^[11]里进行在世的自由竞争。这种机械怪物的魔力又使“齿轮人”在世的自由竞争生成三种基本面相。

首先，自由竞争使得所有“齿轮人”获得一种恐惧的面相，“齿轮人”被抛入一种随时会被现代生产所舍弃的境地，一旦现代生产出现故障，最先被打破的将是“齿轮人”个体。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自由竞争的社会使价值规律得到了充分发展，同时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5](312)}对“齿轮人”起作用。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说，他们必须服从“竞争”的客观指令，为此，资本家通过机器这一固定资本的投入统治活劳动，进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为资本主义社会机制的“主动轮”，资本家基本的机械化设定就是遵守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则，执行其资本“代理人”的任务。因此，“资本家敌视资本家”^{[2](72)}与“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5](874)}，是资本家竞争的基本状态和目的。从工人的角度来说，劳动对资本的实质依附关系使工人们要全身心地投入机器生产过程中。工人必须时刻遵守现代工厂中以机器为标准的“工作日制度”，这种时间制度“按照军队方式一律用钟声来指挥劳动的期间、界限和休息”^{[5](326)}，否则，

它将偏离生产掉入“产业后备军”的庞大群体。对于工人这一“齿轮人”来说，产业后备军与现役劳动军之间存在一种逼迫式的竞争关系。前者作为一种消极力量提醒现役劳动者必须将更多的自由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必须将自己的生活时间整合成最优劳动力进入资本的生产才能避免沦为前者中的一员。显然，正是资本权力调节着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进而调节着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变动，为资本的价值增殖提供充足的时间原料。更糟糕的情况是，在“齿轮社会”的自由竞争中，机器大工业完成了“生产过程的智力同体力劳动相分离，智力转化为资本支配劳动的权力”^{[5](487)}，整个机器生产越来越表现为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复杂劳动，产业后备军自身随之开始进一步分化，在被“提纯为‘人才储备军’之后，剩余的产业后备军由于无法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而成为现代性废物，最终沦落为彻底的赤裸生命”^[12]。不难看出，“科技知识的爆炸式进步—机器体系的发展—人才后备军的建立”组成了一个技术世界的基本模式，传统失业工人只能接受被冰冷和残酷的机器排斥的命运。“人才后备军”也必须熟悉现代机器的详细“说明书”，为此，他必须接受资本的主体塑形，通过被培养和培训来匹配应用机器的技能。在这个过程中，其竞争的结果也不过是变成资本主义“经济上有用而政治上无害”的柔顺主体。

其次，“齿轮人”自由竞争的过程与目的均呈现出双重“自由”的面相，即作为表象的人的自由与作为本质的资本的自由。

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表现之一就是从事实上开发出了自由市场，“经济人”则是市场主体，其基本形象是“把个人确立为利益主体，永远自私自利，漠视他人利益。永远理性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13]。自由市场至少从两个方面保证了“经济人”的自由。一是不管是工人还是资本家，他们都拥有一种法的形式的身份自由，从而使二者能够顺利进行价值交换，即资本原则上可以购买包括劳动力商品在内的所有商品，而工人对劳动力商品则拥有所有权和出让权。二是从功能机制上说，任何竞争都必须以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中介。以此为基础，“经济人”进行自由买卖，并且不得强买强卖。可见，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的经济结构中，人的概念被窄化和抽象为“经济人”，随之，形而上学为之殚精竭虑、求而不得的“自由”则被转换成了“经济人”的交往自由。显然，这是一种虚假自由，结果是人们所谓的自由交换自发地形成了一种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的社会关系，即以物的形式表现的价值关系。从这一刻起，资本成为“普照的光”^[14]，资本逻辑生成了。正是在资本逻辑统治下的冷酷经济现实中，人们与机器相遇了，并成为“齿轮人”。更重要的是，资本建构了一种“唯我论”的主体性机制，它能够进行自我增殖与自我生产，并在现实生活中凝结为一种“幽灵性”的存在，即它以“纯客观的、系统的、匿名的”^[15]方式制造了一种恐怖威胁和暴力统治。由此，在资本逻辑的幽灵统治下，“经济人”的自由又转换成了赤裸资本的暴力。结果必然是，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着”的“齿轮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马克思识破了资本逻辑制造的“自由的诡计”，即“在自由竞争中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3](42)}。为了掩盖对人的自由的暴力剥夺，资本采取了两种方式来美化这种“自由”：一是从结构性的历史断面上，它将“自由竞争”直接看作“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3](43)}。一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历时性状态上，它将“自由竞争”阐释为一系列经济活动内部的自我发展和对以往限制条件的破除。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从经济事实上说，人们过多地受制于国内市场中的行会机制、政府的强制性调控等，受制于世界市场中仍然存在的保护性关税制度乃至闭关自守的经济行为，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正是因为打破了前资本主义生产阶段的种种固有限制，才释放了资本的自由流动性，也使得自由的个人能够更好地融入平等的市场。

第一种“自由观”是资本主义的“自说自话”，它仍然将“经济人”寻求私利理解为一种行动自

由，并将这种“利己主义”推动的社会福利的增加看作人自由发展的表现。其本质是将资本主义看作历史的终结与历史的最后断面。第二种“自由观”的问题是，它将历史进程中限制资本全面发展的因素直接等同于限制人的全面发展的因素。资本披着“为了人的自由”的外衣通过自由竞争破除了传统限制，但其中更多的是阻碍资本自由流动的因素。换言之，它直接将资本的否定性精神等同于自由竞争的本质，认为资本的否定性精神将实现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马克思告诉我们，资本将自由竞争理解为其自身自我运动的必然过程，结果是资本“感到自由，没有限制”^{[3][41]}。也就是说，资本承诺，人们只有在资本的运动中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人们进入资本的逻辑运动中就已经是潜在的、正在实现的“自由人”。实际上，这只是资本导致“齿轮人”空转的意识形态话语罢了。

最后，自由竞争为“齿轮人”制造了两种否定性的现代性幻象。“齿轮人”以一种“有意识的无意识状态”的面相被困于自由竞争中。竞争社会的“齿轮人”折叠在资本制造的现代性自由幻象中。

“我生产故我在”成为全体“齿轮人”的存在论设定。对于在正常的生产机制之中的工人来说，他希望在生产中能够始终维持住“现役劳动军”的地位，并通过参与资本所赋予的专业教育和专门培训能够最终顺利进入“人才储备军”的队列之中。在后福特制的生产中，工人甚至有望重建自身的主体性，重新获得被机器体系所剥夺的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这使得工人获得了一种“自由幻象”，即最终能够脱离“齿轮人”状态拥有自由决定权。现代社会的经验事实在一定层面上支持了这样的想法。从表面上来看，在后福特时代的生产中，“人才储备军”确实拥有更强的时间上的自主决定性。资本家则相对拥有资本上的话语权和自主决定性。资本家们的想法更为激进，他们认为，既然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16]，那么，谁掌握资本谁就掌握了权力，谁就有可能突破“齿轮人”的生存状态。虽然他们不知道资本是规训生命引发生命深度“齿轮化”的真凶，但是他们知道，资本是人们走向“自由”的现实通道。

不难看出，不管是工人还是资本家，都寄希望于以下的发展逻辑：谁拥有更多的金钱(资本)，谁就能够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改善自身的生活状态，谁就有机会离开齿轮状态。鲍德里亚早就揭示了这种自由幻象的本质，它是一种“比X更X，直到超X”的演化模式。这就是第二种现代性幻象，即主体的(齿轮人)自由幻象最终转化为客体的(资本)自由幻象。言下之意，“齿轮人”希望通过资本获得自由，这使得资本的主体身份不断获得加持，最终成为权力主体，形成了“资本通向自由”的“异化”状况。结果就是，作为“产业后备军”的工人时刻想走上“现役劳动军”的发展之路，从而摆脱奴役，走向自由；资本家则向更大的资本家靠拢，从而想尽早尽快地实现竞争自由。不难看出，这种“自由幻象”在工人群体间、在资本家群体间、在工人与资本家之间都导致了更大的、更惨烈的竞争。自由幻象已经成为一种真实的竞争动力，它掩盖了其自身携带的资本的肮脏，成为人们推崇的手段和目的。人们看到了一种“齿轮人”的悖论式存在模式：他们痛恨竞争，他们又热爱竞争；他们拥有自由，他们又没有自由。“齿轮人”想通过自由竞争获得真正的自由，结果反而是资本获得了自由，而人却并未真正获得自由。这就是“齿轮人”自由竞争的“有意识的无意识状态”，而这将使“齿轮人”困在自由竞争的机制中。

三、消解“竞争社会”中“齿轮人”存在样态的三种方案

从表面上看，“齿轮人”及其所追求的“现代自由”都是资本主义的“竞争社会”制造的重要的现代性产品。实质上，“齿轮人”不过是一个受资本权力管制的驯顺且有效的虚假主体，而所谓的“现

代自由”也是功能化、伦理化的资本主义精神，它训斥现代人必须接受如下观念：资本之外，没有自由可言。换言之，自由只在资本的限度之中。这似乎宣告了人们进入一种绝望的循环，即“齿轮人”越是疯狂地运作，越是展开激烈的竞争，资本越是不断发展壮大，现代性的幻梦就越是无限膨胀。人们被资本权力这个“无形的手”牵扯着、拉动着陷入了一种对资本权力的绝对崇拜。概言之，“齿轮社会”中的主体空场与资本权力的在场构成了自由竞争的两大基本表象。那么，人们是否能够超越资本主义的“齿轮人”的存在样态呢？答案是肯定的。现代思想给出了三种不同的方案来解决人们“齿轮化”的生存异化和生活侵扰的问题。

一是“冷却说”。这种观点将“齿轮人”异化的源头归结为现代化的进步，准确地说是技术的加速。事实上，它抓住了马克思论述的重点，即只有当人们进入机器大生产时代之后，“齿轮化”的生成才是可能的。一方面，机器体系的建立打破了传统手工业的生产方式，机器成为生产的基本原料，“齿轮化”由此作为机器体系的一种直观化形象。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机器体系客观化的生产构序代替了手工业生产中的主体劳作，侵入并占据了人类生活的社会图景，“齿轮化”才具有了拟人化的历史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生产力的进步是人们“齿轮化”的罪魁祸首，而科技的加速则是其直接的诱导因素。机器大生产将人类带向技术化的生活世界，它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世俗化，让人们接受了资本主义制造的进步、发展等现代观念。

破局的关键是想方设法让资本主义疯狂运行的引擎冷却下来，让资本主义的庞大机器暂停或是停止工作，只有让这只“机械怪物”的魔力失效，人们才能看到救赎的客观可能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之称为“冷却说”。“冷却说”认为，要让机器体系以及“齿轮人”冷却下来，慢慢降温到其原初状态，进而思考真正的未来。与此同时，人们的观念也需要冷却下来，即人们必须废除资本权力制造的“自由”的历史想象，拒斥资本逻辑开启的现代性的历史进程，回到资本权力尚未驯服生命的前资本主义的时空中。卢卡奇的“物化”批判支持了这种观点，他发现了人类受生产力奴役进而扭曲为物化主体的客观现象，因此，他将反抗的矛头指向了现代社会的抽象建构和中介机制，并希冀当物化机制失效后，人们返回未被合理化的故土。鲍德里亚更是激进地表示，技术的不断发展将导致世界秩序的全面失控，击破未来技术恐怖的方式是用象征交换来取代技术时代的价值交换，在现代技术社会重建一种原始部落礼物回赠交换和非功利耗费的社会关系。“冷却说”提醒人们，不必为放弃机器体系制造的丰沛物资感到遗憾和可惜，否则，人们将迎来一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深度“齿轮化”。“齿轮人”目前只是人的一种资本化的生存样态，而按照资本逻辑无限发展演化的趋势来看，社会生活全面“齿轮化”将是未来一个无法避免的局面。事实上，人们已经步入了一个“全景监视”的时空，时至今日，“整个地球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全景监狱。没有所谓的‘监狱之外’……人们自愿地将自己交付给全景监视”^[17]。我们看到了“冷却说”的无力感，它想回到的是一种未被技术沾染的“原始旷野”，但是它无力真正剥离技术加速带给“齿轮人”的现代印记，它留给技术异化世界的剩余物只是一种浪漫的主体想象和道德哭诉。

二是“加速说”。“加速说”看到了“冷却说”的问题所在，它明确指出，现代的“齿轮人”根本抵挡不住技术加速的诱惑。一方面，现代人无法接受“精神高于物质”的前技术化生活，不管是从现实客观性来说还是从人们的心理接受度来说，人们都不愿意放弃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技术加速本身是不可逆转的，科学技术有其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加速说”并不认为“齿轮人”作为现代的产物是不可超越和消解的。“加速说”认为，人们沉溺于资本逻辑，只看到了资本权力的规训特性，却并未找到适切的视角并与之保持一定的批判间距，这才造成了日常生活“齿轮化”的糟糕情况。换言之，“加速说”认为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以及资本逻辑管制下的“齿轮人”是现代化进程中人所必经的“异化”状态，而整个社会也将在这种“齿轮化”的“竞争”状态中持续发生异变，直到消除这

种束缚。在耶齐的“新异化”阐释方案中，异化被看作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经之路，同时，“克服异化并不意味着回到一个自我与世界的尚未分化的同一性状态，原初我们也是一种关系：适应关系”^[18]。罗萨的“共鸣理论”认为，异化“是一种缺乏关系的关系，在此种状态中，主体与世界内在地分离了，彼此冷漠对待……共鸣因而成了人类存在与一切可能的世界关系的‘本质’，它预先将分离世界和掌握世界的能力消解掉”^[19]。也就是说，在罗萨的理论建构中，异化是共鸣的先决条件，而一种健康的世界关系在于二者之间持续进行的辩证转化。

在如何实现超越“竞争社会”与“齿轮人”的存在状态的问题上，“加速说”直接表明，要让技术加速得更快一些，去拥抱“竞速”而不是拒绝“加速”。在“加速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制定的“适者生存”信条将人导向了两个极端。“齿轮人”或者是作为“现代性废物”而被“竞争社会”所遗弃，或者是作为“人才储备军”被“加速社会”所规训，除此之外，没有中间状态。而技术的加速能够打破这种“坏循环”，“产生一种全新的，不可能被资本主义社会所掌控的空间，这意味着技术加速不仅可以超越我们的控制……也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控制，因为这种全新的形态也碾压了统治者和资产阶级，他们同样对快速运动的眩晕感到不适”^[20]。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和统治是一种对技术的简化和压缩，实际上技术的潜能是无限的。资本正是惧怕技术的这种潜能才想方设法地将之纳入自身的运行逻辑中控制起来。而一旦技术不断加速，它必将冲破资本主义的限制，将我们带入资本逻辑之外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的“齿轮化”与“齿轮人”的存在正是技术加速的证明，“齿轮人”甚至已经是技术加速的全新主体。换言之，“加速说”认为，我们需要从肯定性的、积极性的层面看到“齿轮人”与“竞争社会”带给人们的“异化”启示，即“异化”本身也是一种进步的力量，“现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属于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而是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21](355)}，它将作为一种有力的武器帮助“齿轮人”去“建立社会技术的领导权：既是观念领域的领导权，又是物质平台上的领导权”^{[21](357)}。

我们可以看到，“加速说”将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理解为一种资本主义的治理术，从中抽象出技术加速与资本主义治理的对立性，进而从技术发展的客观向度中引出资本主义崩溃的逻辑。这种理解无疑具有启发性。但是，他们并没有将努力放在构建超越“齿轮人”的社会主体上，而是从肯定“齿轮人”异化的视角将之做了资本化的变装。他们并没有打算拒斥资本主义，而是积极地去拥抱资本主义的力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仍然承认资本逻辑的合理性，其实质是将资本权力对人的统治转换为资本与人的共在协调模式。这是一种弱化了的资本主义批判。

三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在“冷却说”与“加速说”之外开启了对生产关系的批判。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从根本上将超越和消解“齿轮化”生存的问题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联系在一起，认为只有真正变革社会生产关系，才能消解资本主义造成的人的主体空场和资本权力的统治问题，并建立技术应用的合理界域。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引发“齿轮化”社会效应有其客观必然性。这是思考消解和超越“齿轮人”生存状态的基础性原则，而社会历史的发展会为其打上暂时性的标记。其一，马克思断言，资本主义的基本特性是“要么积累，要么死亡”，即“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1](34)}。这意味着马克思从某种意义上承认技术加速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但问题是，资本主义的技术应用客观上使得技术具有了资本权力的齐一性特质，技术的加速会更快地推进资本权力在整个现代社会的布展。事实上，数字技术的发展已经将人们从“齿轮化”推入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数字化的异化，“我们的身体和一切社会行为，都被数字所穿透，我们被还原为数字平台上的一个数据簇，我们借助数字化的虚体来参与社会交往、经济生产和政治参与”^[20]。马克思清晰地看到了技术的发展在一定阶段会成为资本增

殖的限制，进而引发资本主义生产的自反性悖论，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的覆灭，“固定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以及科学的力量，以及人口……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3](149)}。以数字资本的基本运行来说，其唯一的特性就是追求自身无限增殖，这就要求它更快地在数字平台上通过算法实现数据的采集、分拣、储存和转换，从而在这个过程中为数字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明确的界限，将数据冗余排除在外。正因如此，数字劳动的社会化与数字资本无限扩大的趋势形成了矛盾，数字资本本身将成为数字劳动的公有性与数据私有化之间的矛盾的终结点。其二，技术的发展和革命并不像资本主义设想的那样总是遵循线性进步逻辑，技术加速在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内在合理性与其社会应用之间的巨大断裂和反差将一种致命的自我否定性嵌入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于是人们看到，技术的加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但是并没有提高人类的福祉，而是将人物化为“齿轮人”。这就是说，技术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路口，它或是走向资本权力控制下的技术深度异化，进而协助诸如数字资本主义等新型资本主义继续加强对人们的剥削，或是演变成一个由人们共同生产、再生产和共同控制的公有的技术模式。以数字技术形塑的数字资本主义来说，虽然它制造了一种“数字全景敞视监狱”，将人们都变成了数字资本权力监控和盘剥的数字劳动者，但是，这个数字网络实际上是由每一个参与其中的数字用户和数字劳动者共同造就的，它并不是专属于数字技术和数字信息公司的专有知识产权，这决定了它是一个开放的数字空间，平等地向数字用户开放，由其开展数字交往，组建数字社群。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数字技术推动了数字时代互联世界的形成，并且由一种大数据技术、数字算法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数字网络是一个由数字劳动者共同打造的社会关系网络，每一个数字劳动者都在数字实践中创造出独特的、个性化社会存在方式。这决定了人们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现数字信息的协同共享，打破了由大数据公司垄断的数字空间，将数字交往归还给进行数字实践的劳动者们，并在数字信息的共享中让数字技术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基。其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保障的前提下，科学地应用资本并有效地限制资本的力量，建立技术合理应用的界域，使技术发展成果服务于全体人民，由全体人民共享。

在现实性的实践方案中，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证的中国式现代化能够为技术的合理应用开启良性筹划。不同于西方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技术应用，中国式现代化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前提下，从驯服资本、驾驭资本的现实操作出发，“不断提高治理资本运行的能力，科学设立资本‘红绿灯’不断探索和规范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22]，在尊重现代技术发展的内在科学逻辑的基础上，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去规范技术的应用前景。这既合理利用了资本逻辑的成果，充分发挥了资本创造文明的作用，又在顶层设计上合理规划了技术的“健康”形态。对于前一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通过完善科技创新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强科技基础能力建设、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与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一系列措施有力地推动了科技的发展。对于后一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以全新的人民逻辑的技术叙事革新了资本逻辑的技术叙事，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2]。其主要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人民逻辑成为现代化的技术筹划的真正起点。人民而非被资本浸入的“齿轮人”才是现代技术回馈的真正主体，失去了人民主体的现代技术的发展是盲目和空洞的。这意味着从制度规范的层面剥离了现代技术发展对资本的依附性，在技术自身客观的科学逻辑的基础上，重建健康的、合理的技术主体。这是一个技术对资本逻辑的“去依附”的实践过程。其二，人民成为技术发展的边界，技术不能越过人民主体而无限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保障下，现代技术的发展为人民主体塑造的是一种共享的技术成果和共享的文明形态，而非资本逻辑宰制下的资本的私有化形态。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技术发展的社会主义应用是一种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具体创制方案。“齿轮人”面对的现代化困境需要在社会主义的整体重塑中得到相应消解。

四、结语

在马克思的视野中，技术问题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自然科学问题，它既是现代工厂中机器体系生产的直观表象，又是人类文明形态的具体表征。“齿轮化”的人和社会只是资本逻辑座架的一种现代性定在。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规制下，技术畸变为一种资本逻辑驯服社会的力量，它无法在资本主义的成熟体制中完成自身的良性蜕变。即便是技术实现了自身的革命进化，也不意味着资本逻辑会自行退场乃至自动消失。换言之，技术异化的问题必须在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运动中真正地得到消解和克服。马克思将人的本真的存在形态理解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14](107-108)}。这就提示我们，“齿轮人”作为一种“技术人”的异在形态将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实践中得到重新修改和定义。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型现代化叙事，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和社会保障下，人们才能够实现技术的成果共享从而作为一种“技术共同体”而存在，资本也才能获得一种自由空间从而实现自身的良性筹划和良性发展。这就是中国式现代化表征的人类超越资本逻辑的文明新形态所具有的现实的世界意义。它关乎人类的未来，关乎人类完成驾驭资本逻辑开启现代化合理形态的历史使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技术应用的良好范本，它既从现代化建设的层面向人们具体演示了消解“齿轮人”生存、驯服资本的实践力量，又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层面将现代社会的未来走向引入共产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给人们提供了摆脱现代化困境、实现人的自由解放的有效路径。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4] 张一兵. 科学技术与机器生产对工人劳动的深刻变革：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哲学构境[J]. 探索与争鸣, 2022(5): 126-142, 180.
- [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 [6] 罗萨. 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 董璐，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87.
- [8] 霍克海默，阿多诺. 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M]. 渠敬东，曹卫东，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4.
- [9]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159.
- [10]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147.
- [11] 普殊同. 时间、劳动与社会统治：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再阐释[M]. 康凌，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146.
- [12] 王庆丰，苗翠翠. “产业后备军”的生命政治[J]. 国外理论动态, 2019(4): 16-25.
- [13] 赵汀阳. 坏世界研究：作为第一哲学的政治哲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23.
-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8.
- [15] 齐泽克. 易碎的绝对：基督教遗产为何值得奋斗？[M]. 蒋桂琴，胡大平，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12.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707.
- [17] 韩炳哲. 透明社会[M]. 吴琼，译. 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84-85.
- [18] JAEGGI R. Alienation[M]. NEUHouser F, SMITH A, tra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4: 1.
- [19] 罗萨. 不受掌控[M]. 郑作彧，马欣，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 52-53.

- [20] 蓝江. 当代资本主义下的加速主义策略: 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的思考[J]. 山东社会科学, 2019(6): 5–12.
- [21] MACKAY M, AVANESSIAN A. Accelerate: The accelerationist reader[M]. Falmouth: Urbanomic, 2014.
- [22] 王鸿宇. 资本主义治理逻辑的历史性考察: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6): 158–167.
- [23]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27.

“The gear man” in “the competitive society”: The historical metaphor of Marx’s critique of machine technology

DAI Yanchun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Judg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critique of machine technology, modern mechanical industry has established an objective production shaping and technological sequence model. The “gear” thus serves not only as a functional component of the concretization of the machine technology system, but also as a contemporary representation of the material survival of modern people in the capitalist “competitive society”. The “gear man” has become the basic image of the capitalist machine technology era and competes in the world driven by the “freedom” of capital logic. The “free competition” mechanism of capitalism generates “gear man” into three aspects: first, placing them in fear of being broken; second, using the ghostly presence of capital freedom to cover up the emptiness of human freedom; third, using the “money-freedom” illusion of modernity to trap “gear man” in a “conscious- unconscious state,” hence rendering “the gear man” as the competitor unable to achieve real freedom. In the solution to dissolve the existence of “gear man”, the “cooling theory” rejects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acceleration theory” agrees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capitalized technology, neither of which can overcome “the technological paradigm” of capitalism.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s a practical model for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ist technology. It pursues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of achievements under the premise of institutional guarantees, thus demonstrating the specific possibility of dispelling the survival of “gear man” and taming capital, and leading the modernization movement to communism.

Key words: free competition; “the gear man”; capital power; technical criticism; Chinese modernization

[编辑: 胡兴华]